

關於傅雷精神的反思

——《傅雷傳》讀後

• 丹 晨



金梅：《傅雷傳》（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3）。

傅雷夫婦不幸去世已經31年了。他們的沉冤早已昭雪，傅雷的著譯也都已經陸續出版，《傅雷家書》面世16年來不知打動了天下多多少

少父母和年輕讀者的心，現在，《傅雷文集》也已編訂有待出版……但是，作為一個傅譯的愛好者和傅雷人格的崇拜者，出於一種粗淺的理解，覺得傅雷仍然還是一個嶄新的話題。諸如傅雷的翻譯經驗、理論和風格，傅雷的藝術理論，傅雷著譯的欣賞，以至傅雷的命運，特別是傅雷的性格和傅雷的精神，都有待進一步探討研究。它們所包含的豐富內容和營養，是一份難得的、可貴的文化財富，值得我們張揚和汲取。幾年前金梅著的《傅雷傳》對這些方面都有較詳細論述，且有許多獨到的詮釋，給人很深的印象。這些年來，知識界對中國知識份子問題有過許多探討，我想傅雷是中國知識份子中的一個典型，要研究中國知識份子不能不研究傅雷。有人因為譏評作家「過於聰明」而引起了一場不必要的爭吵，我以為這樣說法還是有一定道理，但卻又是偏頗的。因為「不聰明」的作家頗有人在，傅雷就是其中一個。研

這些年來，知識界對中國知識份子問題有過許多探討。研究傅雷，對於認識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不聰明」的知識份子的特點，也是非常重要的。

1945年，一部分著名的民主人士籌組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傅雷也是發起人之一。1950年後，「民進」領導人多次勸說傅雷重回「民進」，傅雷辭謝了，理由是「民進」會章上明確說「民主實現之日，即行解散」。

究傅雷，對於認識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不聰明」的知識份子的特點也是非常重要的。

《傅雷傳》描述了傅雷的一生，特別突出寫到傅雷「習慣於書齋生活」^①。傅雷真正投入社會工作大概不超過三年時間，每次都是他主動辭職回到書齋裏去過研究寫作的的生活，原因是他不習慣、不適應或不滿意那些工作或工作環境。譬如他從法國留學回到上海，在上海美專做辦公室主任、教授，是他一生中從事固定職業時間最長的，但也不到兩年，他卻幾次辭職，最終還是堅決離去。歷來對此有各種解釋，《傅雷傳》作者根據《傅雷自述》得悉其確切原因是「劉海粟（上海美專校長）待我個人極好，但待別人刻薄，辦學純是商店作風，我非常看不慣，故母親一死即辭職」。傅雷和劉海粟私交極好，在法國留學時常朝夕相處，一起遊歷歐洲各大藝術博覽館，研討切磋，甚為相得。但是他疾惡如仇，不能容忍別人的缺失。正如他夫人朱梅馥多次強調傅雷為人「極有原則」，而不是以個人恩怨得失來待人處世。朱梅馥的哥哥朱人秀後來也說：「傅雷的性格剛直，看不入眼的事，就要講，看不慣的，就合不來，後來，他選擇閉門譯書為職業，恐怕就是這樣的原因。」這就是說，依傅雷倔強剛直的性格，對於不合理的、醜惡的事情就要抗爭，至少是採取不認同不合作的態度。青年畫家張弦與傅雷有深厚情誼，他在上海美專執教時受到不公待遇，「抑鬱而死」。傅雷為此聯絡了一些朋友為張弦舉辦了一次遺作展，也因此，「傅雷

與劉海粟發生了爭執，導致兩人決裂。從此絕交整整二十年」。

傅雷對於朋友忠實真摯，渴望友情撫慰說明他並不甘於孤獨，《傅雷傳》寫了很多這方面的故事。所以，他即使回到書齋從事譯述研究工作，也仍然跳躍着一顆愛憎強烈的赤子之心。他翻譯了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莫洛亞的《人生五大問題》、羅素的《幸福之路》等等，都是旨在喚醒正在遭受着劫難與磨煉的人們的心智，激勵美好的、崇高的人生理想和奮發進取的精神。

傅雷一生中有三個時期參加過政治活動，每次時間都很短暫，或因挫折，或因熱情參與之時仍然心繫書齋，念念不忘自己喜愛的藝術研究寫作生涯。第一次是在大同附中讀高中時聲援「五卅」運動，上街遊行講演，繼而又因在校內帶頭開展反學閥的鬥爭而被迫離校。第二次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後，他辦刊物、寫政論、雜文、抨擊時政。《傅雷傳》中說傅雷是一個有深深歷史意識的人，更是一個充滿着現實責任感的人，因此寫了一系列有遠見卓識又有氣勢鋒芒的文章，提出了許多超出黨派觀點局限的見解，結果反而不為左右所容。直到最近幾年，人們「才看到他這種可貴的理智之光和獨立思考的品格，才說『傅雷是對的』」。更有意思的是，1945年，一部分著名的民主人士為了反對國民黨政權而籌組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傅雷也是發起人之一。當時出席者有26人，原定選理事3人，但會上一再增加名額，最終竟要選21名，傅雷不同意這種做法，由於勸阻無效，「就決定以後不再



1955年開始，傅雷參與上海政協活動，但他卻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以「一顆赤誠的心」參加共產黨發起的整風運動，最後竟被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的帽子。這件事嚴重傷害了傅雷強烈的自尊心和美好的理想。

參加『民進』的活動了」。1950年後，「民進」領導人又多次勸說傅雷重回「民進」，傅雷辭謝了，理由是「民進」會章上明確說「民主實現之日，即行解散」。從這些故事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傅雷重實際、重信諾的態度是那樣認真，甚至到了迂執的地步。但這恰恰顯示了他正直倔強的性格，決不容有半點言行不一。須知1950年時，民主黨派也正參與論功行賞，在朝野分一杯羹，大小弄個官做做的時候，這對傅雷竟毫無誘惑，與當時文化知識界熱衷於此的人士相比可說是道不同，也就

不相為謀了。而傅雷的心態卻非常簡單，仍然一心想回到書齋去。

第三次是50年代前期，他在看到共產黨執政後一派欣欣向榮的新氣象，在1955年開始參與上海政協活動。他的認真正直的個性又一次淋漓地表現出來。雖然，他是一個不屬於任何單位、不領取分文工薪的自由職業者，卻為了政協熱心工作並奔走於文學、音樂、繪畫、出版界之間，深入調查研究，真誠地反映高級知識份子的處境、問題、意見和建議。他寫出一份又一份詳盡的書面報告和文章，都是為了國

家的進步和文化事業的發展。儘管他為不能專注於藝術研究工作而着急，但卻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以「一顆赤誠的心」參加共產黨發起的整風運動，最後竟被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的帽子。這件事固然嚴重地傷害了傅雷強烈的自尊心和美好的理想，但是他畢竟又能回到「他那個幽靜寂寞的書齋中，與歷史上的藝術大師們對話作伴」。在經濟收入和健康狀況日益惡化的情況下，他仍然堅持研究和翻譯。先後譯完巴爾扎克小說數種和丹納的巨著《藝術哲學》。

可以說，這是傅雷一生中在精神和物質上遭受壓力最大、處境最艱難困苦的時候，但也恰恰是他的人格和文化創造成就最為輝煌的時期。他像貝多芬一樣是心靈的強者，意志的巨人，頑強地維護了個人人格和尊嚴，固守在自己的精神家園，決不放逐自己的藝術激情和高傲的靈魂，才能以個人的力量抵抗狂暴的政治洪流，敢於響亮回答：「不！」譬如，當他發現自己完全無辜陷入一個惡意誣衊的陷阱時，他就拒絕參加對他的批判會。他說：如果他有罪，願意接受懲處，但以後不再出席會議了。《傅雷傳》說：「這就把事情弄成了一鍋夾生飯。」

有位好心的領導想保護傅雷過關，暗示他承認實質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也行。傅雷拒絕了。事情拖到第二年春天，又命一位作家朋友作說客勸說傅雷，只要求「實事求是作一次自我批評，以結束這一樁公案」。不過，事後還是給傅雷戴上了「右派」帽子。

傅雷沒有固定工資收入，主要

靠稿費收入維持生活。這時出版社不再出版他的書，後來又要他改用筆名才能出書。傅雷又一次拒絕了。「不！要末還是署名傅雷，要末不印我的譯本。」順便說一句，那時對周作人也是如此，周就改用周遐壽名字出書。而傅雷因此整整六年之久出不了書。

1961年，上面想給傅雷摘掉「右派」帽子，只要傅雷認個錯，「雙方好下台階」。傅雷對這個「喜訊」的回答還是一個「不！」他說寧可戴着帽子也不認為當初有錯。後來報上登了關於他摘帽的消息，他不僅不是感激涕零，卻說：「當初給戴帽，本來就是錯的。」後來成了文化界傳說的一句名言。

筆者所以在這裏不厭其煩引述這些材料，是想提醒我們的讀者不要忘記這位知識份子，就像《傅雷傳》中評述的那樣：「唯有將人格看得比任何東西都可貴的傅雷，才能在此時此刻有這等堅挺響亮的言辭。」所以文革風暴剛起，他就已對友人一再表示：「如果再來一次1957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了。」事實證明，這次運動要比上一次來得更為殘暴、更為野蠻，他當然不堪凌辱，只能憤然棄世。

作為一個藝術批評家、翻譯家，傅雷在上述參與社會實際工作和政治活動的過程中，最終為自己找到的位置仍然是在書齋裏，而不是在廟堂官場裏。即使在50年代中期他參加上海政協、作協活動最多的時候，他已為一個季度沒有在書齋工作而着急，說：「以學殖久荒，尤有應接不暇之苦。」他為「代公家」「分心管這種閒事」，「吞了我

1961年，上面想給傅雷摘掉「右派」帽子，只要傅雷認個錯，「雙方好下台階」。傅雷對這個「喜訊」的回答還是一個「不！」他說寧可戴着帽子也不認為當初有錯。

不少時間」而耿耿於懷。即使後來不發生戴「右派」帽子的事情，他也不可能放棄書齋生活。最好的證明就是當時「民進」又一次準備選他當中央委員，通過幾位好友幾次三番來勸說接受；此外，民盟領導人又親自幾次動員勸說他入盟，這個「不聰明」的傅雷竟統統敬謝不敏。傅雷曾說：「黨派工作必須內方外圓的人才能勝任。」或者說，縱橫捭闔、虛實是非、瞬息變幻的政治生活對傅雷這樣的知識份子完全是兩種精神世界。何況，對於複雜的社會環境之不適應，他早在青年時代就已有痛感。30年代，他與羅曼羅蘭通訊時就曾說：「為國家與環境所擠逼，既無力量亦無勇氣實行反抗，惟求隱遁於精神境域中耳」，難以成為「行動人物」。這種信念在後來的實際生活中反覆驗證，使他愈益深信不疑。他承認這是他的短處。筆者也無意以為這是值得仿效的大智大勇之舉，不過是不得已而為之。也因此，在血腥的鬥爭或人欲橫流的歷史風雨中，傅雷注定了很孤獨寂寞的，甚至有點堂吉訶德的迂執可笑的味道。

但是，重要的是傅雷甘於寂寞，自覺要在書齋中尋找自我的價值。這並不是被迫的，而是由於他的稟性氣質情趣所決定的。他雖不從事繪畫、音樂、文學創作，卻有相當的藝術家氣質。《傅雷傳》中用大量事實反覆敘述了傅雷這一性格特徵，說他只有把自己關在書齋裏，「與巴爾扎克、羅曼羅蘭、梅里美、伏爾泰、泰納等大師們神交意會，是更符合他的心情與脾胃」。說他因為參加社會活動多，

為「暫時還不能回到安靜的書齋中去，專心凝神於他所傾心的巴爾扎克、莫札特、黃賓虹……」而着急。他遨遊浸淫其中，如飢似渴地汲取思想文化的營養，從中尋找人生的真諦，心靈的寄託。只有這時，他才如魚得水，融融然樂在其中，感知到自由自在和精神的昇華，天地的遼闊和世界的美好，個人的智慧和能力得到充分的發揮，感情得到暢快的宣泄和共鳴。就如他說自己讀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不禁嚎啕大哭，如受聖潔之光照臨，突然精神為之一振，如獲新生之力。此實余感情生活中之大事」。

傅雷的經歷雖然讓我們看到知識份子的位置是在書齋裏，但這並不表示知識份子就要與世隔絕、孤立自己，而是強調他們應埋首學術研究，貫注於文化藝術科技的創造性勞動。傅雷一生無數次申明自己「雖在江湖，憂時憂國之心未敢後人；看我與世相隔，實則風雨雞鳴，息息相關」。這樣鏗鏘的金石之聲和慷慨坦然的襟懷，顯示了傅雷的浩然正氣。他還說，即使對他最崇拜的貝多芬來說，也是崇敬他的頑強、奮發、堅韌的性格：「療治我青年時世紀病的是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戰鬥意志的是貝多芬，在我靈智成長中給我大影響的是貝多芬……。」他要將自己從這些文化大師中承受的啟示和恩澤轉贈給大眾，以期對時代有所助益。因此，他在教育傅聰時講到自己信守的人生原則是：「學問第一，藝術第一，真理第一。」

即使這樣，書齋生活與憂時報國兩者之間並不是沒有矛盾的，傅

《傅雷傳》說傅雷「是一位思想家式的人物」，這是很耐人尋味的判斷；但說他「是一個以理性主義作先導的懷疑主義者」，卻可以商榷。在我看來，傅雷沒有着意去尋找或信奉過甚麼主義，卻有一種獨特的悲劇精神。

傅雷自喻的「牆洞裏的小老鼠」的意思，楊絳解釋說：「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圓轉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有自己的書齋；他也像老鼠那樣，只在洞口窺望外面的大世界。」

雷自己也能深切感受到。他說自己「始終是中國儒家的門徒。」「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訓在他是徹底實踐了。他還有很濃厚的老莊思想，不僅淡泊名利，甚至連自己的生命也可以付出。他最欣賞和感悟到中國藝術的特徵是給「以宇宙的和諧與生活的智慧」，具有「絕對『無為』的境界」，中國的哲學是「以期達到絕對靜寂的境界」。他還接受了西方人文主義中的個性解放、個人奮鬥、關注個人自由和尊嚴的思想影響。這一切融匯成一個矛盾而完整的傅雷。傅聰說他父親「是個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認為這世界既可怕又骯髒；另一方面，他對世界上發生的一切，又是如此的關懷，如此的痛心疾首」^②。傅雷曾非常深刻地對傅聰解剖過自己的內心世界，說：一方面外界事物的刺激，很容易引起他強烈的反應，「憂時憂國不能自己」；另一方面，「又覺得轉眼之間，即可撒手而去，一切於我何有哉！」即使連最摯愛的妻兒，自己也隨時可能離他們而去。「個人消滅了，茫茫宇宙照樣進行，個人算得甚麼呢！」他說：「這一類矛盾的心情幾乎經常控制了我：主觀上無出世之意，事實上常常浮起虛無幻滅之意。」「不知這是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共同苦悶，還是我特殊的氣質使然。」其實兩者都是。《傅雷傳》說傅雷「是一位思想家式的人物」，這是很耐人尋味的判斷；但說他「是一個以理性主義作先導的懷疑主義者」，卻可以商榷。在我看來，傅雷沒有着意去尋找或信奉過甚麼主義，卻有一種包含了上述

各種思想文化傳承的獨特精神，包含了他的桀敖不馴、憤世嫉俗、憂時愛國、堅持操守和氣節，決不臣服於任何邪惡力量的倔強性格，也還有他自喻的「牆洞裏的小老鼠」的意思。楊絳先生在她的文章中解釋說：「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圓轉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有自己的書齋；他也像老鼠那樣，只在洞口窺望外面的大世界。」^③這是一個很孤獨的形象，也許正是傅雷精神的悲劇性所在。我這樣談論傅雷的精神，並不是要人們都學習他，都做傅雷，都躲進「洞穴」，都要憤然棄世。但有一點我是確信的，傅雷精神的存在說明了人文精神的承續不絕，從中也看到我們民族是有綿延永生的希望。

為傅雷作傳其實是很困難的工作。傅雷一生沒有曲折複雜的傳奇故事，也沒有濟世救人的壯舉偉績，他只是一個平凡的、遭遇不幸的自由知識份子，卻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包括他的著譯，也包括他一生所鑄造的精神。金梅寫的傳記使我們再一次認識傅雷的精神，我想應該感謝他這一份勞績的。

註釋

① 凡引文未註明出處的，均見於金梅：《傅雷傳》（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3）。

②③ 《傅雷與他的世界》（香港：三聯書店，1994），頁65；17。